

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跨界再生机制研究

余 娇, 佟吉丽, 蒋 钰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夹江年画作为四川三大年画之一, 与绵竹年画、梁平年画共同构成巴蜀民间美术的重要谱系节点。其发展依托当地手工造纸业与蜀地雕版印刷技艺, 风格沉厚古雅, 地域特色鲜明。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相互交织的当代语境下, 夹江年画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 在谱系内部, 夹江年画与传统造纸、印刷、民俗等关联产业的生态链断裂, 同绵竹、梁平等地域流派的差异化价值模糊; 在谱系外部, 夹江年画困守单一品类, 致使其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文化语境。本文基于民间艺术谱系理论, 剖析夹江年画在谱系联动、媒介转化、代际传承、产业延展维度的结构性困境, 提出跨界再生的四重机制, 旨在为传统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夹江年画; 民间艺术谱系; 跨界再生; 活态传承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25ycx11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7

一、引言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陆续出台相关政策。2021年相关部门先后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1]《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等文件, 强调要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 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夹江年画以木版套印为主, 兼用手绘技法, 题材涵盖门神、戏曲故事、吉祥图案等, 色彩鲜艳明快, 线条粗犷有力, 具有浓郁的巴蜀地域特色, 是四川民间美术的瑰宝。^[3]然而,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 年画赖以生存的传统民间土壤逐渐消失。城市化掏空了乡村, 春节习俗的简化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年画的需求, 数字印刷技术的冲击也使手工技艺的价值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逐渐老去, 技艺断层的问题日益严重。夹江年画如今陷入了“保护困境”。一方面, 它们必须保持本质特色, 保留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 它们又必须找到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 使这一技艺真正能够“生存”下去。现有研究大多从应用艺术、民间传说和遗产保护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 这为理解夹江年画的文化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 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许多研究仍然将其视为封闭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形式, 很少将其置于“多样民间艺术的互动谱系”中考察。同时, 对于它们如何通过跨学科整合实现“再生”的内部机制, 也缺乏深入分析。因此, 本研究旨在聚焦夹江年画在多样民间艺术谱系中的确切定位、面临的实际挑战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跨界”方式实现“再生”。希望能找出一条既能保留传统文化内涵, 又能贴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创新路径, 同时为当代传统民间艺术的转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价值定位

夹江年画不光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 它本身也是一个活着的“连接点”, 能把多种艺术脉络连在一起。夹江年画因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优势, 在当代具备跨界转型的条件。下面我们将从历史和艺术互动这两个角度, 探讨夹江年画在民间艺术谱系中的价值定位。

作者简介: 余 娇 (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佟吉丽 (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华文化传播;

蒋 钰 (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

通讯作者: 余 娇

（一）历史谱系中的文化根基与技艺价值

夹江年画的历史定位根植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产业传统。夹江县坐落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境内，紧邻青衣江畔，是乐山市下辖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不仅是四川通往雅安乃至西藏的重要通道，还因其丰富的竹资源和闻名遐迩的“竹料手工造纸技艺”而备受瞩目。^[4]夹江自古为纸乡与印刷重镇。明代《蜀中名胜志》记载夹江造纸业繁盛，其造纸技艺始于唐、继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因质量佳、技术精而载誉巴蜀。^[5]夹江县水路交通方便，纸张供应也足，慢慢地就形成了“纸—画”一体化的产业传统，给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夹江年画始于明初，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至清代，县城近郊已形成二十多家作坊，“董大兴荣”“董大兴发”等画店享誉四方。这一历史积淀赋予了夹江年画三重独特价值。一是工艺体系的完整性。以木版套印为主，兼用手绘技法，包含画稿设计、雕版刻制、颜料配制等十余道工序。^[6]二是材料运用的在地性。采用本地手工竹纸，颜料多从矿物或植物提炼，冷暖对比鲜明，久不褪色；三是技艺传承的活态性。以家族与师徒传承为主，形成“口传心授”的隐性知识系统，传递审美判断与文化内涵，展现出开放性与适应性，具备跨界转化潜能。

（二）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节点价值与互动网络

夹江年画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形态，而是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扮演着关键的“节点”角色，与周边艺术形式形成深层的互动网络。在巴蜀年画谱系中，夹江年画与绵竹年画、梁平年画共同构成四川三大流派，形成互补共生的格局。^[7]与绵竹年画的华丽复杂、梁平年画的粗犷朴素相比，夹江年画有着“构图饱满、颜色沉稳、线条硬朗”的特点。夹江年画像一个“交汇点”，与不同门类的艺术互相影响、互相借用。如它的造型手法，与夹江的竹纸手工艺、本地剪纸、寺庙里的壁画及川剧的脸谱，都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武将门神的脸部画法，明显借鉴了川剧里花脸的造型；夹江年画的整体布局，也受了本地寺庙壁画的影响；而年画里那些吉祥图案，与剪纸、刺绣上的视觉样式也很像。正因为这些符号和手法在不同艺术之间通用，夹江年画成为了本地民间艺术体系里的一个“编码核心”。更关键的是，夹江年画里的图像可以跨媒介使用，这为它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奠定基础。如门神这个形象，可以变成剪纸里的镂空语言，可以做成皮影戏里的表演，还能变成衣服上的装饰图案，甚至做成数字化的动漫IP形象。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代要求下，夹江年画可在与文创设计、公共艺术、数字传播的融合中逐步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三、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的传承困境

夹江年画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很受欢迎，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并且随着机器印刷、喷绘等技术的出现，夹江年画逐渐被推向了边缘。目前，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夹江年画面临许多困境，如市场萎缩、创新思路匮乏、传承断裂等，这些困境致使其原有的价值逐渐被忽视。

（一）年画市场萎缩，产品销售低迷

传统年画本就与农耕社会的年节习俗绑得紧紧的，市场需求也跟着习俗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现代人对“年味”淡漠，张贴年画的人变少。^[8]夹江年画的消费人群由以前的农村居民逐渐转向了城市里的文化收藏者。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规模本就不大，需求还很分散，所以年画的销量大幅减少。目前电商平台虽为年画销售开辟了新渠道，但无法阻止整体市场萎缩的趋势。目前，夹江年画的传统实用类产品的销量持续下降，如门神和灶神。至于可收藏的精品，因其价格高而少有人购买，导致整个行业进一步萎缩。市场萎缩还牵扯到了整个产业链，以前的年画作坊都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和造纸、颜料、装裱这些行业紧紧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周边的辅助产业随着年画需求的减少而不景气。随着产业生态的崩溃，年画的市场困境只会愈演愈烈。

（二）年画产品同质，缺乏创新样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夹江年画想要再次走进千家万户，就有必要创作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然而，目前夹江年画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传统夹江木版年画大多沿用旧方法。诸如门神、财神和送子图等经典图案被一再复制，没有任何新的元素。无论在题材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没有突破或创新。缺

乏对当代生活的反思和表达,使其难以在年轻消费者中引起情感共鸣。此外,产品的创新只是表面化,主要局限于调整尺寸或改变安装方式,并未触及核心,即内容叙事和美学表达的深层次转变。目前,基于年画的文创产品仍处于探索的早期阶段。不仅品种少,质量也参差不齐,设计缺乏新意。由于缺乏独特性,这些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较低。因此,夹江年画处于虽然知名度较高,但销量不佳的尴尬境地。

(三) 年画传承断裂, 技艺后继无人

夹江年画的传承也面临着断裂的危机。核心问题就是传承人梯队断档,还夹杂着技艺失传的风险。制作年画是体力活,消耗的时间多,又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年画艺人都愿自己后代传承年画技艺。^[8]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艺人相继去世,技艺人员青黄不接,画家纷纷改行。^[9]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核心技能只能通过工匠的长期实践来掌握。像一些高难度的技法和关键知识,大多只存在于老艺人的脑子里。这些知识尚未得到妥善保存或系统记录,一旦经验丰富的工匠去世,可能会完全丧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艺随人而亡”。此外,传统的“学徒制”模式现在也难以维持。首先,学习周期太长,其次,收入不高,没有人愿意学习。此外,在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基本上没有相关课程,因此传承的路径被切断了。并且年画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需,逐渐成为一种怀旧的象征。年轻人不会考虑将其作为职业,随着年画需求降低,继承者的社会地位较低。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从事这项工作。随着人才的流失,传承的困难越来越严重。

(四) 年画技术挤压, 手工价值降低

夹江年画面临机械化生产与数字技术的双重挤压,手工技艺价值持续贬损。传统年画制作依赖刻版、印墨等数十道手工工序,耗时费力且产量有限,而现代色彩艳丽、价格便宜的机器胶印年画以及喷绘年画效率优势显著,给夹江传统的木版年画造成了激烈冲击。^[8]与此同时,电脑绘图软件和AI生成技术越来越普及,年画设计的门槛也大大降低了。那些“心中有图,手中有刀”的老艺术家的工艺和经验,如今已经被算法取代,手工创作的独特性逐渐失去了优势。从市场角度来看,消费者无法区分手工年画和机器印刷年画的质量差异。低价的机器印刷年画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手工年画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工匠们被迫通过降低价格进行竞争,或转向小众定制工作,其经济回报与其技能价值严重脱节。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替代带来的危机不仅影响生产过程,还导致社会越来越不认可“慢工出细活”的手工理念。手工制作背后付出的时间、艺人的亲身实践,还有其中蕴含的文化温度,都被忽略。到最后,年画不再是一门“手艺”,顶多算是一件“产品”。在以效率为中心的技术浪潮中,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正在逐渐被削弱和侵蚀。

四、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跨界再生机制

上述困境揭示了夹江年画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但危机本身也蕴含着重构的机遇。年画从来不是孤立的民俗遗产,它是活生生嵌在民间艺术谱系里的文化资源,它与其他工艺相互关联。因此,复兴夹江年画需要通过跨领域的合作来寻求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谱系联动、媒介转化、代际传承和产业延伸四个维度探讨夹江年画的当代转型机制。

(一) 年画谱系联动, 重构市场共生

川渝地区的民间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绵竹年画、蜀绣、竹编、漆器等艺术与夹江年画共享巴蜀文化基因,具有天然的谱系亲缘性。^[10]夹江年画的再生应与巴蜀年画乃至中国木版年画的谱系相联系,可建立“年画+”艺术联盟,从而实现技艺之间的互动和产品的融合,例如将年画的构图元素融入蜀绣针法设计,或利用竹编工艺承载年画的装裱形式,形成兼具地域识别度与多功能性的文创产品,从而拓展消费场景的边界。在市场层面,也可以共同创建综合性的展销平台,如“巴蜀年画·非遗市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分散的传承人资源和获取观众流量,降低个体艺人进入市场的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与文旅融合政策对接,将年画体验融入古镇游、民俗节等线路。让消费者从观看者的角色转向参与者的角色,在一些互动体验活动中与夹江年画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跨区域的谱系联动不仅可以防止“孤岛式”保护带来的文化狭窄,还能通过相互借鉴增强各个传统的独特性,形成“和而不同”的民间艺术生态体系。

（二）年画媒介转化，激活文化方言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非遗传承保护有着重要影响。数字化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保护的一种新型方式，其通过文本、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全面的记录，保证其以数字化形式永久保存并便于检索。^[11]夹江年画作为一种传统民俗工艺，由于储存方式有限和传播手段落后，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因此迫切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媒介转型和跨学科再生。我们认为在此背景下，应着重推动三个层面的转型：第一层是数字化存档。传统木版画、老照片以及制作工艺都应进行高精度扫描，并系统分类，以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夹江年画数字基因库”。第二层是创造沉浸式体验。可以开发互动式AR年画，或者使用虚拟技术还原过去的民俗场景，如春节贴年画和祭灶等。数字资源的优势在于不受时间或地点的限制，复制成本低，使其非常适合在线推广和资源共享，从而通过个人体验让传统文化得以“复兴”。第三层是人工智能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辅助年画图案设计并创建个性化定制。然而，这必须基于“人机协作”，核心的文化符号应保持剪纸年画的本质，不能歪曲或误传。

（三）年画代际传承，创新培养体系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离不开“人”的因素，传承人拥有传统手工艺技能，使这些传统技艺得以延续。因此，对传承人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夹江年画的活态传承可以建立“基础教育—社会普及—高等教育”的代际培养体系，实现传承人梯次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基础教育层面，可以在夹江县中小学开设年画课程，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与非遗的情感联系。在社会普及层面，传承人自己应积极拥抱新媒体，利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开展线上技艺展示，实现技艺的跨代际传播。而如何将夹江年画转化成年轻人更熟悉的设计语言，并使之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诀。^[12]培养创新型传承人，应该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教育在夹江年画传承保护中的作用，推动非遗文化与高校教育的融合。具体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建设专业非遗夹江年画相关课程体系，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意识。二是建立夹江年画制作工坊，请夹江年画传承人进行讲学，让高校学生能够亲自体验夹江年画的制作过程。夹江年画进入高校，一方面可以使夹江年画逐渐被认识了解，另一方面可以培养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精湛技艺的创新型夹江年画非遗传承人。

（四）年画产业延展，重塑价值符号

要使夹江年画在当代真正“活起来”，就需要打破“工艺品”的单一标签。必须运用IP思维来重振这些老符号，建立完整的“内容—产品—场景”的产业链。首先是内容层面。夹江年画中的门神、财神和戏曲人物都是现成的文化IP。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它们背后的故事，将其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资产。例如，这些角色可以制作成动画角色，发布为数字藏品，或与其他品牌进行联名和授权。将只能挂在墙上的静态图案，转变为能够持续产生新内容的文化符号。产品层面需要将年画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开发跨界产品，如文创家居和潮流服饰。这样人们购买的不是“年画”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和生活方式。场景层涉及创建沉浸式体验。可以建造以年画为主题的城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并举办互动展览，连接生产、展示和消费。这将年画从“春节装饰”转变为日常可见的审美生活象征。总之，产业延伸的关键在于重新诠释夹江年画的价值，它不仅仅是民俗物品，更是承载怀旧情怀、审美趣味和文化自信的现代符号。

四、结语

夹江年画是乐山非遗的一块瑰宝，它当下的处境反映了中国很多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本文从民间艺术谱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夹江年画面临的几个结构性难题：市场萎缩、创新思路匮乏、传承断裂等。然后，我们系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跨界再生机制，希望为夹江年画探索出再生的新路径。研究表明，夹江年画的活态传承核心不在于盲目迎合市场而自我解构，而是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的互动网络中，找到传统基因与当代语境的创造性结合点。这种再生既是技艺的延续，更是文化逻辑的重构。

参考文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21年5月25日.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年8月12日.
- [3] 夹江县人民政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夹江年画:2024年12月27日.
- [4] 陈馨逸.夹江年画视觉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25.
- [5] 余哲雅.夹江年画文创产品设计策略研究[D].湖州师范学院,2023.
- [6] 夏东慧.夹江木版年画制作及纸材选择[J].造纸信息,2022,(6).
- [7] 江淼.巴蜀地区绵竹、梁平、夹江木版年画艺术特征多维比较研究[J].天工,2025,(31).
- [8] 曾冬梅.夹江年画发展浅析[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20,22(03).
- [9] 沈泓.中国濒危年画寻踪夹江年画之旅[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 [10] 郝雯婧,王雪梅,许志强.四川非遗文化整合与传承[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 [11] 夏三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以女书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2] 李超德.非遗研究和创新设计需要新视角[J].湖南包装,2020,35(01).

A Study on the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Mechanism of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Genealogy of Diverse Folk Arts

Yu Jiao, Tong Jili, Jiang Y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New Year painting genres in Sichuan,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together with Mianzhu New Year Paintings and Liangping New Year Paintings, constitute important nodes in the genealogy of Bashu folk fine arts. Its development is rooted in the local handmade paper industry and Sichuan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s, with a solemn, simple and elegant style and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diverse folk art genealogies are intertwined,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survival dilemmas. Within the genealogy, the ecological chain connecting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with related industries such as traditional papermaking, printing and folk customs has been broken, and its distinctive values different from regional schools like Mianzhu and Liangping have become blurred. Externally,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have long been confined to a single form, gradually alienating them from th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lk art genea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lemmas of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dimensions of genealogical linkage, media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industrial expansion, and puts forward a fourfold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olk arts.

Keywords: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Folk Art Genealogy;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Living Inheritance